

宋初的地缘政治与南北政策

闻轩轩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宋太祖君臣针对北方藩镇割据、武将跋扈, 南方政权林立的国内地缘政治特征, 制定了“南北异术”的处理策略。在北方主要是通过“稍夺其权, 制其钱谷, 收其精兵”三大政策和文臣知军事、文臣知州事等后续安排以巩固统治, 而南方则交替使用军事征服与和平统一的战略以削平诸国, 完成统一。根据不同区域的轻重地位和政治需要, 宋初实行了“中原本位政策”。这一政策主要体现在据北地、用北人和承北制等层面。

关键词: 宋初; 地缘政治; 南北异术; 中原本位政策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9) 01-0078-08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9.01.013

The Geopolitics and the North-South Policies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WEN Xuanxu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China 475001)

Abstract: Emperor Taizu of Song Dynasty developed the strategies of the “North-South different policies” for the geo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about the regimes of the warlord separatists in the north and the independent regimes in the south. In the north, three policies were developed including “weakening the power of military leaders, controlling regional finances and collecting good soldiers” and more policies that all of the officials knew more about military and local affairs to consolidate the ruling. In the south, strategies were used involving military conquest and peaceful reun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importance and political needs of different regions, the policies for the central plains standard were carried out by the contemporary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in which the keys were the government was in the north, the northern people were employed and the policies in the north were kept and developed.

Key words: the Early Song Dynasty; the geopolitics; North-South different policies; the policies for the central plains standard

公元960年,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 取代后周建立宋朝。由于宋太祖君臣的巧妙措置和妥善应对, 新生的赵宋政权如愿避免了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并得以延续三百余年。宋初政权的成功稳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统一, 对于任何一个对赵宋史事感兴趣的学者来说, 都是值得探讨又无可回避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 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学术研究毕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事业, 今天的研究者基于新的研究条件和研究视野, 对传统问题进行新的思考, 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根据现代政治学的定义, 地缘政治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 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 并借助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调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它是行为体之间通过空间实现的互动关系, 以及互动所构成的政治关系在空间的存在、分布和运动”。^[1]对于宋史学者来说, 把地缘政治理论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引入宋史研究领域, 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可行的, 本文即拟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们知道, 地缘政治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 但以往学界关于宋代地缘政治的考察往

收稿日期: 2018-01-05

作者简介: 闻轩轩 (1995—), 男, 河南睢县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往着眼于北宋或南宋的稳定时期，关注点集中在宋朝与“境外”各政权的互动关系，^①忽略了宋代地缘政治形成期的状况，尤其是宋初的“境内”地缘政治。笔者不揣鄙陋，试图对宋初地缘关系与现实政治的互动下南北地域政策的异同及其演变做一初步探索。限于学识，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地缘与宋初政治

如众所知，继五代而立的北宋，处于唐宋社会大变革的关键节点，承接了晚唐五代以来纷乱不安的政治局面和政治遗产，其建国伊始就面临着迥异于汉唐的国际国内形势。安史之乱以后，有着“中央帝国”之称的盛唐时代逐渐瓦解，中原王朝的内外地缘政治结构均由此发生了变化。

安史之乱以后，唐廷基于现实情况和自身统治的需要而广设藩镇，这一举措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冲击了西魏、北周以来的“关中—山东”型地缘政治格局，^②并由此产生彻底的结构变化。张国刚先生将唐代中后期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性、边疆御边型和东南财源型四种类型。^[2]根据这一划分标准，结合当时具体的政治形势，可以将中晚唐的地缘政治结构分为三大块：以关中为核心的唐廷直接控制区、河北藩镇割据区和东南财赋供馈区。陈寅恪先生指出：“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3]随着唐末五代的政治重心东移和经济重心南移，关中地位日益下降，河南的洛阳、汴京一带成为新的政治核心区域，尤其是出身于沙陀的代北集团统合了河北道和河东道以后，^[4]¹⁹⁷⁻²⁰⁵北方地区逐渐凝结出新的统一因素。

而南方地区也因为长达几十年的独立，自成一体。就当时中国整体的空间形势而言，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地缘政治格局。

北宋建立之初的内外环境，就周边族群而言，由于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从而不得不在河北重兵备御外，对于其他或暂时不接壤，或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外夷”大多无暇顾及，此处姑且不论。就传统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区域而言，北宋的处境也不容乐观。首先，北宋虽然全盘接受了后周的疆土，但在开封西北不远的泽、潞和东南的淮南，分别有怀有二心的实力派军阀昭义节度使李筠和义成军节度使李重进。其次，河东地区基本为沙陀集团的刘氏占据，号为北汉，始终与后周一北宋对峙。再次，南方地区更是政权林立，江南有李昇建立的南唐，东南则有吴越和闽（福建），湖湘一带有荆南和湖南两块较小的割据势力，四川有孟氏的后蜀，两广则是刘氏建立的南汉。宋太祖“一榻之外，皆他人家”^[5]^{卷9,205}的感慨，的确道出了实情。从历史渊源来说，这些区域虽然都有分裂的倾向，但其性质是不同的。北汉和李筠、李重进是后汉—后周一北宋权力嬗代过程中残余的内部矛盾，而南方地区则几乎始终是五代政权鞭长莫及之处，也就是说宋初的国内地缘政治整体上可分为南北方两大区域。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把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的话，可以看出，除南方政权林立的客观事实外，北方地区的北汉经“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6]^{卷292,9658-9657}已经失去了成为北宋边患的实力。李筠“素骄易，无谋”，^[5]^{卷1,13}李重进又“守薛公之下策……士卒离心……计谋不用。外绝救援，内乏资粮”，^[5]^{卷1,27}都非腹心之患。唐末五代帝王频繁更迭的历史经验表明，对于北宋来说，在其所承接的北方中国区域范围内，地方上的藩镇割据和中央禁军里的武将跋扈，才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从南北区域角度考察宋初

^①以笔者管见所及，相关论著主要有吴晓萍：《略论地缘政治与北宋外交》（《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2-16页）；余蔚：《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71-183页）；杜文玉：《宋金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特点》（《史学月刊》，2011年第7期，第30-38页）；于爱华：《南宋地缘政治关系研究》（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等等。

^②关于唐代的地缘政治结构，参见李鸿宾：《尉迟迥事变及其结局——新旧时代转变的表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9-13页）；《唐朝的地缘政治与族群关系》（《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第135-140页）。

政治形势的视角,学界先贤早已有所采用,只是未明确和当时的国内地缘政治结合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裴汝诚和许沛藻两位先生在探讨宋初君臣“取天下”之志和“一天下”之策时,极具洞见的指出:“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地区政权频频更迭,战乱不已,……广大南方地区,政权林立”。^[7]将赵宋政权建立之初面临的双重困境——藩镇割据和政权林立,分别归诸南北两大区域,并注意到五代末期,北方、南方以及西南地区出现了区域统一的趋势,反映了前辈学者的卓绝史识。可惜的是,由于文章关注重心的限制,未能在这一方面多加展开,故今日仍有可发之覆。

二、析“南北异术”

上文已经指出,由于后盛唐时代的特殊历史背景,宋初的国内政治形势大体可分为南北两大块区域,宋太祖面临的困境也主要根据这两个区域分为这两个方面。在北方主要是藩镇割据和武将跋扈,在南方则是政权林立。根据两者不同的情况,宋初君臣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处理方略。换言之,宋初君臣采取的稳定政权和统一全国的政策,事实上是有南北两个面向,这种不同的处理对策可以概括为“南北异术”。根据问题急切程度而言,稳定政权,建立起对北方中国的牢固统治,是先于翦平南方诸政权,实现“一天下”目标的。不仅如此,前者还是后者得以实现的政治基础。

北宋代后周而立,其所管辖的地理范围自然以后周统治区域为基础,但宋太祖君臣面临的政治难题却不仅有周世宗尚未来得及完全解决的地方藩镇和中央禁军中的不稳定因素,还需要面对后周残存的实力军阀的不臣和叛乱。无论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宏观布局,还是“攘外必先安内”的现实考虑,宋太祖君臣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必然是底定中原,而其中第一步正是消除对北宋政权具有一定直接威胁的李筠与李重进的武装力量。前面已经指出,两者均非北宋腹心之患,因此宋太祖的措置不过是设法避免“二凶并作,分我兵势”,^{[5]卷1.24}从而得以集中兵力依次平定。这一目标完成后,更重要的任务已经摆在宋太祖君臣面前。

彻底消除导致唐末五代政权频繁更迭与地方分裂的因素,是北宋集权政治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

也是宋初君臣的头等要务。宋太祖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在诛灭了李筠和李重进的叛乱后,就迫不及待地召赵普问策:“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早已洞悉宋太祖心中所想,知道他必有此问,胸有成竹地回答道:“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5]卷2.49}黄巢之乱以后政治上的两大患中作为腹心之患的禁兵和作为肢体之患的藩镇基本都在中国北方,所以解决这两个问题才是宋初君臣巩固政权的当务之急,也构成了北方战略的核心任务。宋太祖采取赵普之策,首先是通过“杯酒释兵权”方式解除了宿将典禁兵之权,然后通过上述“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大政策等手段逐渐撤罢地方上的藩镇,^[8]除此之外,在中央和地方还分别有文臣知军事和文臣知州事的后续措施。至于这些战略的具体实施情况,前人已言之甚详,此不赘述。

宋太祖北方战略的最初打算,还包括攻取北汉,实现对中原地区的完全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曾于雪夜访赵普问策,明确表达了自己“欲下太原”的心愿。赵普以“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无所逃”为由劝诫,认为应该首先攻取南方各个政权。宋太祖在得不到赵普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以“吾意正如此,特试卿耳”^[9]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并适时地调整政策,从先下太原转为“先南后北”。终于,在平定李重进和李筠叛乱后,北宋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基本稳定。宋太祖着手制定了对南方政权进行经营部署的战略方案:“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党,取李筠,征维扬,诛李重进,皆一举荡灭,知兵力可用,僭伪可平矣。尝语太宗曰:‘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廩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止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10]据此可知,宋太祖对统一战争的攻伐对象及其先后顺序是有着明确的筹划的。

按他的计划，首先攻取后蜀，接下来荆、湖和南汉，最后是南唐。建隆三年（962年），湖南的武平军节度使周行逢的病逝及其后的张文表叛乱，继任的周保权遵从其父遗命向宋朝求救，这一突发事件虽然有些出乎宋太祖预料，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大体上还是没有打破他的作战计划，反而使得北宋借机“假道灭虢”，加速了统一方案的实施。而从荆南归附的翰林医官穆昭嗣还为宋太祖“西讨”提供了有关“蜀中地理”的重要信息，^{[5]卷5,134}可谓意外之得。

这里不妨重新审视宋太祖统一战争的目标和攻取步骤。笔者认为在宋太祖的计划之中，有几个环节的安排至关重要，也为我们透露了宋初统一方案的重要信息。首先，在宋太祖的原本打算中，后蜀和江南是攻伐的重中之重。而之所以把他们放在进攻顺序的首尾是有深意的。前揭引文已经表明宋太祖征讨南方诸政权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解决五代以来因为“兵连祸结”而导致的“帑廩虚竭”的财政窘状，从而达到“国用富饶”的目标。后蜀和南唐正是南方政权中最富庶的区域，史载后蜀“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11]南唐在代吴之际已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6]卷270,8832}首先出兵后蜀还因为相对于南唐来说，后蜀的实力较弱，易于攻取，且四川地区的财赋和人力也能为接下来的征讨提供物质和兵员支持。而后蜀、荆、湖和南汉的渐次征服，事实上也是为了实现对南唐的战略包围，为进攻江南做准备。其次，我们发现南方政权中的吴越和福建的泉漳地区本就不是宋太祖的作战对象，这点颇值得玩味。如果将宋初削平各国的具体情形结合起来一起考察，可以看出，宋太祖和宋太宗对不同政权是有区别对待的。对于实力较强，且又不尊正朔的后蜀、南汉、北汉和南唐，主要采取军事征服的方式，而对于实力较弱，且主动臣服的吴越和福建，则是以和平统一为攻势。^①南唐和荆、湖的情况值得注意，南唐后主李煜“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兵，阴为战守计”，^{[5]卷13,280-281}且“江左笼山泽之利，国帑甚富”，^{[5]卷6,158}是北宋最为

重要的征服对象。因此，在面对南唐使者徐铉“事大之礼甚恭敬”的质询和“乞缓兵以全一邦之命”的恳求，宋太祖才会口不择言地训斥道：“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5]卷16,350}荆、湖的变乱有些事发突然，但从北宋的处理方式和不战而降的结果看，宋太祖对于两地的态度也应是推行和平统一战略的。

学界一般将宋太祖的作战方案称作“先南后北”统一战略，并对其利弊得失进行了不懈的探讨，但大多讨论都局限于战略本身而就事论事。实际上，“先南后北”统一战略并非一成不变的，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根据具体情况的变迁作出某些调适是再正常不过的。更重要的是，“先南后北”统一战略是宋初重建政治权威这一整体目标中的一环，必须结合其他政策做通盘考虑。我们注意到，在宋初“一天下”的目标基本实现后，北方地区所采取的收兵权、文臣知州事等政策仍在进一步推行，并向南方新征服地区渗透。而军事活动的重点，则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的北汉、契丹和党项。整体而言，此后的北方战略以政治和军事政策为重心，南方地区则以安抚民众、收拢财赋以及发展生产之类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为主，仍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南北异术”的倾向。

从宋初集权统一的历史过程看，我们发现，宋太祖君臣巩固政权和统一中国两个政治目标大体上是有南北方两个不同面向的。换言之，宋初巩固政权的举措，如“稍夺其权，收其精兵，制其钱谷”三大政策和文臣知军事、文臣知州事等后续安排，一开始是针对北方地区藩镇割据和武将跋扈的情况制定的；而统一攻势中的军事征服与和平统一的策略最初则主要是为了收服南方诸割据政权而采取的不同方案，这也即笔者提出的“南北异术”的主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谓的“南北异术”并非绝对，根据具体情形的不同和历史形势的变迁，这些措施有着某些混淆与转换甚至改变的趋势。毕竟手段只是其次，最终目标的达成才是宋初统治者的真正考量。

^①关于宋初的和平统一战略，参见程民生：《宋初和平统一战略及其实践》（《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第11-19页）。

三、中原本位政策

通过对宋初君臣关于南北两大区域采取不同措施的检讨,可以看出,摆在宋初君臣面前的第一要务乃是巩固新生的赵宋政权,在此基础上方能进一步开拓进取,统一中国。这种务实的政治考量和政策推行其来有自,最重要的是缘于唐末以降帝王频繁更迭的历史教训,以及继承后唐以来消除混乱重建统治秩序的努力,尤其是后周世宗的励精图治和积极进取的对外态势。为行文方便,笔者将这种情况概括为“承周鉴唐”。根据宋初政治发展的趋势,可以进一步归纳出两个历史结论:一是非鉴唐不足以固宋,二是非承周不足以一统。对于前一结论,上文已经做了简要论证,学界也从宋初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关于后一结论,前述虽略有涉及,但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承周”最直接的一个方面是“承周之志”,即继承周世宗统一中国的志向,这也是宋初君臣意图翦平列国,实现“一天下”目标的必然要求。但仅仅提到“承周之志”远未触及问题的关键和核心,这里所谓的“承周”的“周”并不仅仅是后周的意思,事实上包括了对五代时期北方中国为重构盛唐式权威的奋斗成果的继承,而尤其以后周,特别是周世宗为重要标志。换言之,“承周”也即是“承北”,而“承北”的重要结果是形塑了宋初的“中原本位政策”。^①其内容包括据北地、用北人、承北制三个方面,以下就以这三个方面进行展开来探讨这一问题。必须指出,笔者这一思路受到了陈苏镇先生阐释“承秦立汉”问题的启发。^②有所不同的是,宋初的社会政治形势远比秦汉之际复杂,宋初政治的重点也根据后来的历史发展,由“承北”而逐渐形成“中原本位政策”。毛汉光先生早已指出魏博汴梁一带为北宋建国时的核心区,^[12]但未从宋初历史的角度进行论证,此处稍加添缀,以证其言不诬。

(一) 据北地。晚唐五代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虽已大大加快,但毕竟尚未完成。^[13]南方各

国之所以能够割据一时,正如南汉官员邵廷珪所说,主要由于“承唐乱,居此五十年,幸中国多故,干戈不及”。^[14]也同样出于五代朝廷无暇顾及的缘故,所以南方一些政权——如南唐——虽积极发展生产,却也只能形成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和政治军事强国,而缺乏统一中国的条件。中原地区尽管战乱不断,却仍然在都城汴梁形成了“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资用富饶”^{[6]卷281,9300}这样全国性的政治经济中心。且随着汴河的修浚,江南的物资也需要北上销售,史称“淮、浙巨商贸粮解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15]这也就意味着,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不能作为支撑南唐逐鹿中原的物质基础和财源保障,反而成为了汴京城市崛起的广阔腹地。有学者从“地运南趋”的角度论证五代宋初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和宋太祖“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正确,并举朱元璋为例,^[16]似乎是有些以后观前的不当之论。就当时的历史情形而言,北方依旧拥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极大优势。如后周太祖郭威招集流亡、恢复生产的举措很快就使得以前流亡南方的农民“襁负而归中土者……凡数十万口”。^[17]因此,继五代后得以掌控和统治北方中国的宋朝,是具有南方政权所缺乏的先天优势的。在传统意义上,中原为正统所在,拥有深厚的舆论基础,是民心之所向。一些南方割据政权的君主甚至通过臣服中原,换取五代朝廷的认可和名义上的正当性。况且北宋的“据北地”,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对北方地区的占有,还承袭了周世宗经营天下的形势,这样也就具备了发起统一战争的主动权。南方政权中一些有识之士对于“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圣宋受命,凡所措置,规模益宏远”^{[5]卷4,84}和“一统海内,其在此乎”^{[5]卷4,92}的认识,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二) 用北人。如众所知,学者普遍注意到,在宋初官员地域构成存在“北人独大”的现象,

^①笔者这里的“承北”意思是继承了五代朝廷在北方中国(中原地区)的经营,为便于行文,简称“承北”。而“中原本位政策”里的“中原”是一个略小于“北方”的概念,指的是北宋所承接的后周朝廷直接控制区,不包括北汉以及北方一些藩镇势力较强的周边地区。

^②相关内容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8-66页)。

本文将这种现象视为宋初“中原本位政策”中的“用北人”政策。为了更加直观和便于分析，现将

《宋史》本传和《循吏传》人物中的北宋前三朝官员的地域分布情况制成下表1。

表1 北宋前三朝官员地域分布情况

类别	开封府路	京西路	京东路	河北路	河东路	陕西路	淮南路	两浙路	江东路	江西路	湖南路	湖北路	福建路	广东路	广西路	成都府路	梓州路	利州路	夔州地	北方某地	南方某地	不详地
文臣	13	19	31	46	7	17	2	5	7	3			1	11	1	1	6	1	4			
武臣	14	14	6	57	43	6	2		2				1			3				5	1	2

注：1. 本表根据程民生先生的《宋代各地官员数量统计表》制作；2. 参见氏著：《宋代地域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2-134页。

据表1的统计，北宋前三朝文臣共178人，其中北方文臣计136人，约占文臣总数的76.4%；南方文臣计42人，约占文臣总数的23.6%；武臣共156人，其中北方武臣计145人，约占武臣总数的92.9%；南方武臣计9人，约占武臣总数的5.8%。可以看出，无论文臣，还是武臣，北方地区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是源于宋初对五代官僚体系的全盘沿袭，但具体情况殆非如此简单。五代时期虽然纷争不断，但经过几十年的分裂重组，遂在北中国转成一强力的军事集团——河北河东集团，宋太祖本身就是此集团的重要成员。中央朝廷中又始终有通朝仕宦的北方职业文官系统在政权频迭的情况下，维持着政治的延续。到后周宋初之际，两大势力逐渐合流，形成了当时传统中原王朝范围内最为强大的统一力量，宋初君臣正是趋利避害的利用这一力量取得了集权统一任务的最终完成。此外，我们还可注意到，河北地区文武官员在官员总数中的突出地位，毛汉光先生将这一现象称作后周北宋初叶的“河北优势”，认为“斯亦国史上之一大变局也”，^[18]颇具慧眼。至于“河北优势”对宋初政治史的影响，笔者拟另文探讨，此不具述。随着对诸政权的渐次削平，众多南方降臣进入宋廷，如何妥善地安置他们，则需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根据林煌达先生的研究，宋初政权的处理方式主要有将诸降国有名之士真于馆阁修纂群书，将重要官员遣送至京畿及其附近，或授予闲缺性质的官职；也有部分担任地方上的幕职官，或滴官任用。不过随着宋政权和南方诸国降

臣的互动关系的加深，宋廷改变了消极防备性质的政策，改为积极开放政权的方式，让这些降臣及其子弟逐渐认同宋政权，并愿意为此政权效命。^[19]但是，宋初统治者对南方诸国降臣确实存在着对其正当性的质疑和普遍的不信任与猜防。^[20]这些现实考虑，也是促成宋初用北人的因素之一。

（三）承北制。陈寅恪先生极具洞见的指出，就隋唐制度的渊源而论，更多继承的是北魏、北齐和南朝的梁、陈之制度，而直接与隋唐相关联的西魏、北周反而影响较微，^[21]北宋的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北宋创业伊始也面临着三种制度可供选择：一为唐制，二为北方五代之制（简称“北制”），三为南方诸国之制（简称“南制”）。在这三种制度中，北宋主要承袭的是北制，其次是唐制，而南制却基本上无足轻重。以唐宋变革期枢密院为例，南方诸国的枢密院制度几乎未对唐—五代—北宋前期的制度演变序列产生太大影响，也缺乏与北宋制度之间的渊源关系。^[22]究其根本，在于南制的实质是出于适应地方性统治的需要，对唐制进行的简单沿袭、损益甚至摒弃，^①缺乏对更大区域的掌控能力与复杂情况的应对能力，更缺乏成为大一统国家制度的潜力。换言之，南方诸政权仍是建立在唐朝节度使体制上的地方统治机构，并没有发展进化成有望统一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体。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宋承唐制”，其实是经五代政权改造了的唐制，也即北制。朱熹与其弟子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问题：“或言：‘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

①关于五代时期南方诸国制度，参见任爽主编《十国典制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与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每章的“诸国”部分。

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23]北宋固然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24]但之所以有这种情况也是因为北制核心是出于规避唐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弊端和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有选择性、目的地引入藩镇体制去改造唐制，寄托着五代政权重建中央政府权威和完成再度统一的期求与努力，能更好地为北宋政权的集权统一服务。我们知道五代政权基本上都是由藩镇而成为中央政府，因此能够有效的结合藩镇体制和唐制的长处，适时地作出调整和不断地进行整合（尤其是侍卫亲军的发展），由此逐渐形成了新的权力结构，此新权力结构奠定了北宋重新统一的基础。^{[4]112-181}也正因为北宋主要是承北制，所以在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研究唐宋时期制度变迁的论著中，对十国的情况普遍失于考察也就情有可原了。

上述的据北地、用北人和承北制，构成了宋初“中原本位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北宋以开封为都城，以北方中原地区为帝国的核心腹地，在此基础上经营江南，并进一步抗衡契丹辽朝等外族政权，则是“中原本位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当然，这种归纳多少有点从后人视角观察追溯的意味，或许不大能让人信服。好在宋人自己的议论为笔者关于“中原本位政策”的理论，提供了一些坚实可靠的依据，这些议论集中体现在宋初士大夫奏章中关于“根本之地”的阐述上。端拱二年（989年）正月，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上书陈备边御戎之策，指出：“今郡县虽多，要荒且远，除河北备边之外，民力可用者惟东至登、莱，西尽秦、凤，南抵淮、泗而已。此数十州者，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5]卷30,674}这是宋初士大夫对于北宋“根本之地”具体区域最为确切的论述，从张洎所指“中土之根本”的地域空间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其基本涵盖了狭义上中原地区的大致范围。如众所知，隋唐时期主要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国家重心在西北一隅，中原地区在当时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却并没有成为核心区域。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根本之地”的转换，也应是唐

宋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

四、余论

本文从地缘政治和南北政策视角出发，对宋初集权统一的历史过程进行了一些自己的考察。毋庸讳言，本文所涉及的事件、使用到的材料，前人都不同程度的探讨。不过笔者尝试站在不同的角度，在广泛吸收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解读旧史料，以期获取对传统问题的新认识。基于此，笔者提出了“南北异术”“中原本位政策”两个概念，试图用来统摄宋初政治史上的重要施政方略，同时认为这些方略处在不断地变化更新过程中。随着宋太宗朝以后“守内虚外”政策的推行，北宋的“中原本位政策”渐次变异，核心区域收缩并越来越集中于京师开封周围。如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十二月，赵安仁上言说道：“京师，天下之根本也。”^{[5]卷45,978}此后，虽不时有臣僚强调“河北为天下根本”^①，但多是出于对宋王朝长治久安的考虑而呼吁重视河北地区边防地位和加强军事训练的中肯之言，并非当时实情。

宋神宗朝以降，虽以收复燕云地区作为对外政策的最终目的，但一直以来推行的均是西北积极政策，河北地区长期处于消极防御状态，武备废弛。宋徽宗理政之初，张舜民出知定州，上书指出：“以臣观之，今日河朔之势，正如陕西宝元、康定之前，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一旦仓猝，不可枝梧。……又为将者，多是膏粱子弟，……百年之间，未尝知烽火之警，虽有出屯，不离本路，唯是优游暇日，安得不骄且惰也。”^[25]到宋钦宗即位时，更是“中国军政不修几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溃散之余，不习战阵，故令金人得以窥伺，既陷燕山，长驱中原，遂犯几甸，来无藩篱之固，去无邀击之威”。^[26]于是，在“守内虚外”政策导致的地缘政治结构的缺陷和党争、腐败、边防体系崩溃以及女真铁骑南下等多重压力下，北宋最终走向灭亡。

①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四天圣四年八月辛巳条载王沿疏，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二月乙卯条载富弼言，卷一六六皇祐元年三月庚子条载包拯言，以及卷一七〇皇祐三年四月乙酉条载王举正言等。

著名法国史家托克维尔曾经指出18世纪时法国的人口、经济能量、社会活力、行政事务与权力等高度集中于首都巴黎，是大革命爆发后旧体制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27]同样，在女真攻势下北宋统治的迅速瓦解，部分原因正在于国家运作的重心高度集中于京师。当这种地缘建构的缺陷与政治军事危机合流时，也就造成开封城破即等于北宋灭亡。因此，逃亡南方的宋高宗君臣，在长江沿线建立了多个“独立攻防区”，其后继者也并未采用汴京时期“中心—边缘”式的地缘政治结构，^①虽说这主要是由于“行在所”临安区位条件的限制和对重建政府权威过程中政治现状及战时状态的妥协，但又何尝不是鉴于中原覆败的惨痛教训的反思呢？

[参考文献]

- [1] 陆俊元. 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5: 9.
- [2] 张国刚. 唐代藩镇的类型分析 [M] // 唐代藩镇研究. 增订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42-44.
- [3]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209-210.
- [4] 王赓武.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 [M]. 胡耀飞, 尹承, 译. 上海: 中西书局, 2014.
- [5]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6] 司马光. 资治通鉴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7] 裴汝诚, 许沛藻. 评宋初君臣“取天下”之志及“一天下”之策: 兼及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J].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0 (3): 100-104.
- [8] 聂崇岐. 论宋太祖收兵权 [M] // 宋史丛考.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63-282.
- [9] 邵伯温. 邵氏闻见录: 卷1 [M]. 李剑雄, 刘德权,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4.
- [10] 魏泰. 东轩笔录: 卷1 [M]. 李裕民,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
- [11] 张唐英. 蜀梼杌 [M] // 傅璇琮. 五代史料汇编 (拾): 卷下.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4: 6095.
- [12] 毛汉光. 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 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之拓展 [M] // 中国中古政治史论.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22.
- [13] 程民生. 中国北方经济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30-237.
- [14] 欧阳修. 新五代史: 卷65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818.
- [15] 文莹. 玉壶清话: 卷3 [M]. 杨立扬,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6.
- [16] 王育济. 宋初“先南后北”统一策略的再探讨 [J]. 东岳论坛, 1996 (1): 83-84.
- [17] 薛居正. 旧五代史: 卷112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485.
- [18] 毛汉光. 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 [M] // 中国中古政治史论.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418-474.
- [19] 林煌达. 宋初政权与南方诸国降臣的互动关系 [J]. 东吴历史学报, 2004 (12): 129-157.
- [20] 伍伯常. 北宋选任陪臣的原则: 论猜防政策下的南唐陪臣 [J].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2001 (10): 1-30.
- [21]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3-5.
- [22] 李全德. 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232-234.
- [23] 黎靖德. 朱子语类: 卷127 [M].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042.
- [24] 邓广铭. 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 [M] // 邓广铭治史丛稿.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00.
- [25] 黄淮, 杨士奇. 历代名臣奏议: 卷33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4315.
- [26] 李纲. 李纲全集: 卷48 [M]. 王瑞明, 点校.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559.
- [27] 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 [M]. 冯棠, 译. 桂裕芳, 张芝联, 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11-115.

^①关于两宋地缘政治格局的差异, 参见余蔚: 《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6期, 第171-183页)。